

► 導讀： 你所不知的中日戰爭

林志宏（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）

長期以來，中日關係因為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影響，常常處於「對立」之局。特別是戰爭所導致的傷害和陰影，非但令兩國之間民眾彼此互不信任，連帶也加深了誤解，甚至造成許多悖離歷史事實之附會。固然戰爭的雙方有侵略者、被侵略者之分，可是受到現實無情的考驗，乃至「後見之明」所影響，參與其中的人們往往只選擇了部分記憶，透過文字的表述傳給後世。於是乎，沉沒在人心的回憶雖然被有意識地挖掘而呈現，可是史實資訊的取得，則不免產生偏差，難以窺探全貌。因此直到今天，人們在反省這段歷史時，依舊是各說各話，無從對焦。中日關係研究或抗日戰史便處於類似的緊張情緒中，無法進行全面而理性的討論。本書所帶給讀者的，毋寧就是展現一個大家過去並不了解的面向；它的出現，儘管並沒有改變關於中日戰爭的既定印象，卻可深化我們對這場戰爭的認識。

這本書的主人翁——陸軍上士梶野渡，其實跟當時許多民族國家的公民一樣，共同為國從軍，奔赴前線與敵人打仗，也犧牲了自己最寶貴的青春年華。然而與其他日本軍人不同的是，在梶野渡的「中國經驗」裏，我們可以看到更多屬於人性的一層，體察原來在戰爭殘酷的一面之外，其實還有貼近人們日常生活的部分。故事主要發生的時間為 1940 年至 1946 年初；範圍大都在今日江蘇、安徽兩省交界，那

是中國人所說的「淪陷區」或「佔領地」。在這裏，人們為了求得生存溫飽，採取了這樣或那樣的選擇；而形形色色之生活方式與安排，並非如原來想像般，只由鐵板一塊的意識形態所決定。彷彿我們以往所熟悉的抗戰歷史及其「定論」，經由親身經歷者梶野娓娓道來，頓時出現了缺口而不可盡信。也就是說，本書提供給讀者的，並不是業已預設的概括論斷。

在我看來，本書還有許多史料意義，足以豐富我們對中日戰爭歷史的想像。以下我嘗試勾勒自己的讀後感，將書中認為最有價值的地方，提供給中文世界的讀者參考。

首先可以看到，梶野渡書中的內容，深化了吾人對戰爭日常生活之理解。此處有必要指出的是：近代戰爭頗與傳統社會中的形態有所不同。過去戰事之成功經常取決於沙場上的戰術，甚至有時倚賴個別優秀的軍事謀略人才，居間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；然而，近代民族國家的戰爭早已大不相同，最重要乃係「總力戰」——經由全體國民共同參與，政府運用各項統制的手段，將人力及物力等各項資源進行充分而有效的利用，達成國防之目的，以此作為決定勝負的關鍵。因此，戰事成敗與否，非惟取決於親身參加作戰的人們而已；無論前線或敵後地區，任何一項環節都有可能造成決定戰局之影響。換句話說，如何捕捉或考察「戰爭體驗」，也絕非僅通過直接衝鋒陷陣，乃至造成殺戮的那群人。在「全民皆兵」的總力戰考量下，宣傳無形中成為輔助作戰的最佳利器之一；相關研究學者 Harold D. Lasswell 即說「宣傳是思想與思想的戰爭」，^(註一)是以，本書提到的「華中特務工作」，必須從這方面來衡量其意義。

其次，梶野一書內提到戰爭導致的各種情形，讓參與其中的人們

改變了原來的生活規律，甚至是想法和念頭；該書提到日軍「用醫療活動贏得民心」，指的便是類似的情形。最發人深省的，是四河子附近某位村長講的一段話：「我國至今一直喊着革命、革命的同時，反而戰亂不斷，最近與日本展開了新的戰爭，農民被棄置不顧。」村長選擇於己有利的日方，彷彿與今天我們對抗日戰史的認知有所差異，但細思後其實不然，或許這才真正是人類求生存的本性，反映了「淪陷區」農村基層社會的心聲。如果我們仔細地耙梳 1940 年代相關資料，也有若干可資印證。像常任俠（1904—1996）的日記便記載：

赴新民處訪雲川，暢談，多聞所未聞。桂人自主皖政，剝削之深，殺戮之慘，前所未有的。最小官吏，亦娶數女為妾，殘殺青年學生，非扒心，即活埋。活埋之法，令自掘坑，推入坑內，即灑石灰其上，澆水焚死。扒心亦具別法，因其嗜食人心也。岳西縣有一小村，老夫婦兩人，只有一媳，子已從軍，後廣西兵隊經過此村，三人皆扒心而死，心已為人食矣。言之駭人聽聞。生番之習，不圖復現於今日矣。皖北駐軍，奪民糧食，售之敵人，因是人民怨毒，常起衝突，敵人入侵之速，即由於此。(註二)

常任俠講的是桂系軍隊負責戍守在安徽省，除了與日軍作戰外，並兼治理該省省政；但駐軍屢次擾民的結果，使得當地百姓憤而轉向支持敵人。常氏之語，恰恰為本書提供註腳，說明這並非屬於獨特現象。可以這麼說，戰事開始後，人們的生活體驗有時脫離常軌之外，行為也就因應現實而有不同。(註三) 另外還有一處，更加耐人尋味：是獨步第五十六大隊與國府軍隊合作，共同擊退八路軍，甚至農村民眾擔任

雙面間諜，分別蒐羅情報。這樣的例證現在看來簡直不可思議，然而，如果對照陳橋驛所謂「吃兩口水」之情形，^(註四)也就不會令人感到意外。有了本書做為證言，我們更應體認所謂「戰爭體驗」，絕非只是敵我雙方對峙的單一聲音，可能還須有多重多元角度來思考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。

第三項特色，是有關近代日本對中國的理解，乃至學術如何成為「文化戰」一環的意義。梶野渡在書中曾經提及，戰時伴隨軍隊深入基層社會的日本人，身份並非全是士兵，當中還有曾是教授、學生、記者等一類的知識份子。他們被選為「宣撫班員」，雖然在軍中地位甚低，卻擔負起恢復「淪陷區」秩序、安定民心的工作。究其實，這群人約自晚清時期便開始陸續出現，被冠以「支那通」之名；尤其 1920 年代以後，日人海外觀光的風氣盛行，為了培養「國民」與「帝國民」的意識，許多民眾先後組團至東北亞（朝鮮、滿洲等），甚至 1931 年還有便宜的「東亞周遊券」，範圍包括中國、朝鮮各地。^(註五) 這群經年累月到處遊歷之「支那通」，非但遺留下大量不同地區的旅行見聞，還有針對中國的各項描述資料。他們的來源頗為複雜，^(註六)且扮演着相當微妙的角色；一方面，他們主要進行「親善」工作，另一方面則提供日方情資，藉以了解中國實情，乃至獻策規劃。「支那通」由於來自日本社會各界，迄今數目仍難確斷，可是發揮了許多實際的作用。有意思的是，經由這些人形塑出對中國的理解，造就日本式的「東方主義」（Orientalism），^(註七)促發許多人保存「東亞文化」的風潮。以中國為例，他們基於熱愛傳統中國文化，紛紛以學術為名，熱切維護、研究那些屬於「東洋遺產」的古物，就像書中所提到的梶野氏保護〈醉翁亭記〉石碑，發生了一段曲折的故事一樣。今日我們重新省

思近代日本對華學術調查活動，不僅需要釐清其中政治層面與文化層面的多重意涵，更該理解其帶來的歷史遺產為何，如此才能客觀地檢視這段歷史。

最後，本書還有唯一無法被其他同類型書籍取代之處，就是那些珍貴難得的照片。相信對史學有一定程度了解的讀者都知道：「讓圖像自己說話」是現代歷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方法。由於文字帶有局限性，往往未必可以真正還原歷史場景，但圖像卻能超越時空，重新增進後人對當時的想像。圖像所具備的「語言魅力」，有時遠比預期的記憶要來得強烈，甚至印象令人深刻。拜現代科技發展所賜，攝影技術從十九世紀上半葉發展以後，歷經百年轉向紀實題材，迅速被大眾接受，成為流行的呈現畫面的方式之一。梶野渡則善用了這項科技，為我們保留他私密而真誠的至寶。這些照片如何流傳，本書前言已略有交待，此不贅述；值得留意的是，它們充滿了豐富的信息，提供吾人得以進行解讀的可能。如眾周知，在戰場上，任何人面臨生命交關之際，片刻都不容懈怠，當然也就不太可能有充分餘裕去捕捉任何畫面。可是，梶野一書卻讓我們有機會目睹日軍在中國的各項實況——無論突擊前的軍事準備，還是佔領「淪陷區」後的種種活動。當中固不乏屬於宣傳性的照片（譬如「滁縣各界歡迎馬場部隊長凱旋攝影」、「大東亞戰爭一周年紀念」等），可是細審之下，也能從中推敲日軍如何進行各式宣傳以利作戰的意義。此外，書內有些景物照片，由於原蹟早已無存（如南京菊花台所建造的「忠靈塔」），則極富實證價值。更重要的，我們也能從這些照片中得悉：透過一位陸軍上士的眼光，中國到底是呈現怎樣的風貌，又是如何一處「想像的國度」？至於怎麼體察本書照片中的言外之意，那就端看讀者自己的用心了。

擔任編寫整理本書的廣中一成先生，兩年前我有幸與他相識於偶然的場合。後來承他不棄，慨贈本書日文版，我讀後深感饒富趣味，覺得有必要介紹給中文讀者。因此野人獻曝，主動撰寫此篇導讀文字，同時希望重新對中日戰史與研究提出反思之道。

- 註一 · Harold D. Lasswell, *Propaganda Technique in World War I* (Cambridge, Mass: The M.I.T. Press, 1971), p. 8.
- 註二 · 常任俠：《常任俠日記集——戰雲紀事》（臺北：秀威資訊科技，2012），下冊，頁 234，1944 年 5 月 8 日條。
- 註三 · 例如，最近我讀到《陳克文日記》，即使後方的公務人員也有類似筆觸。如戰爭帶來生活諸多不便，造成種種桎梏與約束，但每日仍須繼續過下去，而玩樂享福的情況照舊，甚且還有變本加厲之情形。陳氏即感嘆說：「個人的精神需要休息、娛樂，民族的精神亦何嘗不如是呢？」俱見陳克文著，陳方正編輯校訂：《陳克文日記，1937-1952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3），頁 362，1939 年 1 月 28 日條。
- 註四 · 陳橋驛回憶戰時那些「淪陷區」學校，校長往往由偽縣府來任命，但流亡於國統區的原地方縣府照樣發公文，形成一校兩主管的荒唐局面，而苟延於其中，兩面都討好者，即稱「吃兩口水」。見陳橋驛：《八十逆旅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），頁 183。
- 註五 · 有山輝雄：《海外觀光旅行の誕生》（東京：吉川弘文館，2002），頁 40-52；白幡洋三郎：《旅行のススメ》（東京：中央公論社，1996），頁 86-92。
- 註六 · 以中國而言，根據原覺天分析，這些研究和調查群體的成員約有四種類型：第一，屬於帝國大學系統下的東洋史研究學者；第二，長時間居住在中國、與中國人密切往來及有親近情感的「中國研究者」；第三是東亞同文書院出身、精通中國語言的學人；最後則是直接參與農村實態考察的調查員。原覺天：《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——滿鉄調査部・東亞研究所・IPR の研究》（東京：勁草書房，1984），頁 11-14。
- 註七 · 有關這個問題的考察，特別是東洋史學發展，可以參考 Stefan Tanaka, *Japan's Orient: Rendering Past into History*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93).